

去联接与非联接：微信朋友圈非使用的技术可供性与用户能动性

刘松吟 刘德寰

【摘要】本文梳理了当前媒介非使用研究中功能主义、后采纳行为和媒介抵抗等理论脉络的启示与不足,基于对微信朋友圈非使用者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提出了“去联接—非联接”的概念框架,以强调技术可供性和用户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媒介非使用的重要性。研究从技术可供条件、用户能动角度对去联接和非联接进行辨析,并从意义建构和媒介反思性等方面探讨用户如何能动性地实践和合理化媒介非使用。研究发现技术可供性塑造了去联接和非联接的基础和可能性,而个体通过多样的和情境性的媒介非使用发挥能动性,在不同的生命情境里通过媒介非使用具现对社交媒体参与的反思性。

【关键词】媒介非使用;去联接;非联接;技术可供性;能动性

【作者简介】刘松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与传播系博士生;刘德寰,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原文出处】《新闻与写作》(京),2022.5.83~93

一、研究源起

2019年的微信公开课上,腾讯高级副总裁、微信事业群总裁、“微信之父”张小龙第一次公布了微信朋友圈的数据,提到有一亿用户设置了朋友圈三天可见。而到2021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两亿。尽管2021年每天使用微信的用户达到10.9亿(其中有7.8亿用户进入朋友圈,1.2亿用户在朋友圈发表内容),但微信用户对于社交软件的需求和使用行为显然发生了剧烈而根本性的变革。腾讯研究院针对停止使用朋友圈的用户所撰写的报告中,曾使用了“小众退潮”和“社交斋戒”等语汇来概念化社交网络非使用。^①但从今天的数据和情况来看,对社交网络非使用的“小众”形容明显是不合时宜和缺乏解释力的。

作为一款国民级社交软件,微信朋友圈提供了自我呈现、交流、关系建立等诸多核心社交功能,是

用户社交联接的重要载体。而近年来微信团队在朋友圈可见功能上的不断迭代,则体现了国民社交软件微信在粘性设计和用户需求方面的权衡。^②以2017年3月27日微信ios版本更新6.5.6版为例,过去用户彻底关闭朋友圈功能的行为不再可行,取而代之的是朋友圈可见范畴的具体化,例如对朋友和陌生人的细分以及朋友可见天数的细化(从半年变为全部、半年和3天可见)。

微信不断调整朋友圈可见功能的背后,隐藏着激活和提升用户活跃度的目的。实际上并非只有微信朋友圈面临这一问题,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的报告,接近50%的18-29岁的智能手机用户不再使用Facebook和Twitter之类的大众社交媒体,而转向使用可以自动删除消息的小众软件。^③不同于商业考量和“活跃度”视角,移动互联网用户显见的逃离社交媒体的趋势引起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广泛关

注。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呈现出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性,也囊括了定量和定性研究在内的多种方法论,其中媒介非使用(media non-use)和中辍行为(discontinue)成为解释用户非持续性或者终止使用社交网络应用现象的两大研究脉络。然而,当前的研究主要基于对用户使用行为、需求和心理的功能主义解释,对媒介非使用行为的概念没有形成更细致的概念化和理论化,也较少涉及用户对媒介非使用行为的反思性和自我意义赋予。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提出“去联接(de-connectivity)和非联接(disconnectivity)”的概念框架,从技术可供性、用户能动性和实践意义合理化三个方面对媒介非使用进行深入的概念和实证辨析。

二、文献回顾

在传播学者看来,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联接的文化生态中(culture of connectivity),并且数字技术使用所产生的联接的权力和权利正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④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在数字时代的媒介非使用与基于数字技术设施的结构不平等密切相关,而不能仅仅从个人动机和使用与满足的角度来理解。然而,在个人动机与社会结构的二分法中,用户对于结构的能动性反应和反思被忽略了。对结构性脱离的讨论没有考虑到主动与被动的数字脱离之间的微妙差异,而对个人动机的强调则失去了理论化的可能。站在万物互联和媒介非使用普遍化的交叉点,本文将用户有意识的、主动的媒介非使用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和概念化的起点,探讨用户、媒介技术非使用和联接性的关系。本文基于媒介非使用的文献材料,梳理了功能主义、后采纳行为以及媒介抵抗等三个理论脉络,指出媒介非使用研究中对用户的能动性、反思性和多样性的强调为理解用户媒介非使用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本文结合概念工具与实证材料进一步提出“去联接和非联接”的概念辨析,对社交媒体非使用行为中用户的能动性和反思性进行微观分析。

(一)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媒介非使用

基于用户使用和非使用某种技术的二元框架,学者将媒介非使用归因于使用技术所不能获得的效

用(utility)。^⑤这一研究反映了媒介非使用研究中的一类经典范式,即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出发,将技术非使用视为用户需求和效用失衡产生的结果。一部分媒介非使用研究延续了技术非使用的理论视角和认识论,利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和期望失验理论检验关系需求、娱乐需求、信息需求的不满足和失调与不持续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⑥有学者进一步细化了不持续使用意愿与用户个体因素、技术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的关系,认为不持续使用意愿中的不同因素具有相互消减和强化的作用和关系。^⑦

在功能主义的观点里,用户与非用户之间存在着坚实的边界,而跨越边界的动机则来源于理性思考和计算。用户在此类研究中被塑造为理性能动者,拥有着对自我技术功能需求和效能感(self-efficiency)、强大的自省能力和对社交平衡感的高度敏感和需求。当从媒介技术使用中获得的效能感与负效应平衡被打破时,信息压力造成一种强烈的疲倦和挫折感,而以离开社交网络为代表的非使用行为则成为“灵丹妙药”。因而社交倦怠(social fatigue)也成为解释不持续使用某种媒介技术的主流理论,长时间使用、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信息质量低下都是倦怠的来源。^⑧

从方法上看,大部分此类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因子分析和各类回归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将媒介非使用或者非使用的意愿作为因变量考察不同用户态度、需求和使用习惯变量的解释力。^⑨此类研究将用户能动性的思考和行为置于考察的核心,突出了个体的态度和情感认知在理性思考媒介实践中的重要性,使用者的意图与动机成为主导媒介非使用行为的关键要素。但功能主义和理性决策的认识导致此类研究对于媒介非使用的概念化和操作化较为简单,没有考虑到个体复杂多样的媒介非使用情境。

(二)后采纳行为视角下的媒介非使用

不同于上述的功能主义范式中将媒介非使用视为和使用截然相对的身份(即用户和非用户),另有一类研究基于创新扩散中的后采纳行为理论,着眼于媒介非使用中的行为多样性和多义性,解析复杂而具体的媒介行动。基于实践的视角也解释了这一范

式比前者更依赖定性研究去发掘不同的实践背后微观的情感、态度和认知,学者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例如拒绝使用(refusal)、限制性使用(limit)、撤回(withdrawal)、脱瘾(detox)和回归(reversion)等用于概念化不同后采纳行为。^⑩不同的类型学还被应用于分析非使用中的不同状态的用户,例如在不同的技术语境中的滞后用户、稀有用户和非用户,^⑪以及媒介脱嵌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即动机收集、脱离实践、修正的脱离实践和回归动机形成。^⑫媒介非使用越来越成为一个伞状术语,其被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容纳不同的媒介脱离实践并且强调不同媒介非使用状态之间的流动性和可转换性。不同的类型学概念有其具体的语境和假设,但此类研究强调媒介非使用行为应当在具体的媒介实践和使用历史中被理解,而非仅仅是用户的动机。

早在本世纪初,有学者便基于创新扩散呼吁应当关注采纳后的中断和拒绝后的采纳行为。^⑬部分研究则聚焦后采纳行为,进一步提出了“间歇性中辍行为(intermittently discontinue)”的概念。^⑭通过对更加动态的采纳过程的全面把握,间歇性中辍行为与前采纳和非采纳以及持续性采纳行为互斥,提供了一个对非持续性采纳行为的微观视角。对社交网络非使用行为的动态理解,也对前一种以采纳者自我效能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有学者推翻过去对非使用行为的动机研究,指出隐私忧虑与朋友圈中辍行为不相关,而社交倦怠并不一定转化为中辍行为。^⑮此类研究提出了较为多样的类型学来概念化媒介非使用过程中的不同后采纳行为,但较为结构化的理论模型在分析非使用的多元态度、情感和认知时遭遇较大的困难,对定量分析方法的依赖也很难将社会性和情境性的因素纳入考量。

(三)媒介抵抗视角下的媒介非使用

前两种研究脉络反映出了一种以行动者或行动者为中心的思路,而在西方的语境中媒介非使用还被从一个集体行动的角度来分析。媒介非使用在许多研究中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使用或者是负面情绪引发的消极行为。^⑯此类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于将作

为一种商业使用行为的互联网联接视为用户主动选择的结果和当前社会中的缺省行为,因而消极的互联网新媒介使用是令人意外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于此,越来越多的实践和研究将媒介非使用视为一种媒介抵抗(media resistance)。数字时代对个体保持持续连通性和可得性的强制性期许,使越来越多人对“永远在线”的文化感到不满。媒介非使用因而被视为一种对强迫性在线的媒介体制的微观抵抗。^⑰但一些学者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媒介抵抗的权力属性,媒介抵抗被认为是阶级的和性别的权力指标,是富人、知识分子和精英等社会优势群体的特权。^⑱这种形式的媒介抵抗被国外学者奉为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消费者行动主义和商业激进主义。^⑲然而,给予用户“断开联接的权力”作为媒介抵抗行为的话语目前主要在基于西方社会的研究中被讨论,而在非西方语境中较少提及。有国外学者提出媒介非使用具象了个体对永远在线的强制性社交环境的媒介抵抗,^⑳本文认为在非西方的语境中讨论作为媒介抵抗形式的非使用行为,需要对其技术条件和意义建构进行概念化和实证辨析。

总的来说,过去的研究从功能主义、后采纳行为以及媒介抵抗三个不同面向,理解个体的媒介非使用行为,其中用户理性决策、行动的复杂性以及行动者的能动和反思性具有启发意义。但此前的研究只聚焦于个体使用行为的动机和多样性或者媒介抵抗等单一面向,而没有考虑到非使用的技术基础,也没能在区分不同媒介非使用行为的基础上辨析用户的能动性。本文认为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探讨媒介非使用,应当跳脱行动者中心主义和集体行动主义的藩篱,将多样化的媒介非使用放置在个人的生活政治中,去探究和辨析媒介非使用中连续发挥作用的、能动和技术可供性。因此,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将媒介技术、意义建构和媒介自反性纳入概念化框架的媒介非使用的研究视角。

媒介非使用应当被看成是人、技术与社会互动环境之间的一种协商。^㉑这种协商的复杂性需要对多元的媒介非使用中不同的意义建构和用户能动性进行微观分析,而非仅基于动机和行为的类型学创

造或者泛化为一种政治性的意见表达。本文从协商仪式的角度解析媒介非使用,认为个体通过对媒介非使用的仪式化实践践行能动性,建构社交断联的意义,反思个体的社交参与。其中,非联接的媒介非使用实践呼应了非持续性后采纳行为的逻辑,非联接状态的用户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在场,以非使用的方式使用。相较而言,去联接的媒介非使用实践反映了反社交的媒介抵抗带来的自我实现和能动性。在吸收过往研究概念和视角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非联接和去联接的媒介非使用行为差异也体现在不同生命历程情境中个体对社交卷入的重要反思,用户的不同媒介非使用实践也有着不同的技术表征。因此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超越过往的动机—实践的类型学,在技术可供性和用户能动性的张力中理解用户的媒介非使用实践?用户又如何对媒介非使用实践进行意义建构和媒介反思?结合过去媒介非使用研究所提供的概念工具,本文提出了去联接和非联接的概念,对不同媒介非使用实践中的用户能动性、社会意义建构和反思与技术可供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考察和辨析。更重要的是,在去联接和非联接的二元关系中思考技术与个体生命历程如何为用户能动性和反思性设定边界,以及个体的媒介能动和反思如何在超越边界中成为可能。

三、研究设计

本文基于对微信朋友圈用户的深度访谈,探究不同的媒介非使用行为背后的个体对社交网络和联接的反思性和意义赋予。本研究基于立意抽样,通过各种渠道发放招募广告,最终基于性别、年龄、职业、婚恋状态、教育背景和微信使用历史等因素,选取曾经使用朋友圈但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曾经关闭过朋友圈现在处于开启状态、不断关闭又重启朋友圈以及没有关闭但基本非使用朋友圈功能的微信用户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研究目的,笔者对100份回收问卷进行筛选,考量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职业等因素,最终选取15名受访者,进行60-80分钟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受访者中,8人为男性,7人为女性;年龄在21-44岁之间;职业、教育背景与婚恋状况各

异。访谈数据转录后,借助Nvivo12对人工转译的访谈材料进行整理、编码与主题分析,最终形成媒介反思性、社会资本以及生活政治三个主题,并在三个主题中探讨去联接和非联接的媒介非使用行为的结构性质差异。

四、分析与讨论

(一)媒介非使用行为的能动性与其技术可供性基础

有国外学者认为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社交网络拥有一种结构性的辩证关系,即连接(connectivity)和非连接(disconnectivity)之间相互依存,非连接只有在连接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③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所指出的持续性联接和永远在线的社交压力与社交网络非使用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重新理解。新媒体时代联接的基础设施和社交的规范性与媒介非使用几乎是一体两面,二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关系之中,万物互联的便利性在互联网诞生之初几乎就伴生着社交透支的代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功能主义的研究在面临复杂的使用行为时遭遇失败,当个体的非使用实际上是一种平衡和协商时,非使用就可能表现出非常灵活多样的状态。使用与满足理论可以探究有哪些可能的因素参与协商,但将复杂的协商实践还原为需求和动机则解释力不足。

因此,将媒介非使用视为一种个体对联接的协商是必要的,更广义地说,非使用也应该视为一种使用。本文因此强调关注媒介非使用的技术可供性和技术边界。腾讯研究院发布了多项关于用户对永远在线的社交文化的负面情绪以及朋友圈社交斋戒行为的实证报告(包括实验法和访谈法),微信的开发团队也在不断进行迭代,为用户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和选择,以创造性地断开/连接他们的线上社交生活。^④例如允许用户定制和控制与朋友圈的断开/连接,对朋友进行标签分类并使帖子针对特定的标签群体可见。2017年,朋友圈用户可以选择只让朋友“看到”最近6个月或最近3天的帖子。2019年,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即只让最近一个月的帖子“可见”。这些“可见”功能的迭代与微信的粘性社交设计策略兼容。在朋友圈的案例里,媒介非使用已经

被整合并设计为一种新的功能形式。通过为用户提供情景化和定制化的非使用工具包,朋友圈平台设计并塑造了用户非使用的可能性,非使用者则根据这些可得的(accessible)功能想象和实践他们的非使用能力。Karppi在《断联》一书中提出断开联接的可能性是我们理解社交媒介所持有和行使权力的核心。^⑤这要求我们重视媒介非使用实践背后的技术条件和可供性。媒介平台所许可、承认、预见和设计的断开联接的可能性也在这个意义上与用户能动性紧密相关,用户与平台之间的张力经由媒介非使用的中介得以展现。

在访谈中,受访者之间的实践非常多元。例如完全删除朋友圈甚至不使用智能手机,或者基于非常复杂的标签设置来达成朋友圈对部分人空白的效果,或者将过往的朋友圈全部设为隐私仅自己可见。这种多元实践不仅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同一个用户的非使用历史也非常丰富,其反复性和灵活性已经超出了此前学者所提供的类型框架。^⑥有鉴于此,有必要进一步细化非使用的具体实践以及用户对实践的合理化。本文无意提供一个事无巨细的新的类型框架来囊括所有的可能性,而是希望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非联接和去联接来引入媒介非使用中忽略的技术条件。

因为我是很喜欢那种有参与感的那种生活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能说,完全不想发朋友圈,是有很多时候是想发朋友圈的。(受访者41601)

虽然不再发布朋友圈,受访者41601强调她仍是向往“参与感”的,她通过偶尔浏览好友的朋友圈获取维持小圈子社交所需的语料,也在一次集体活动中发了仅参与者三天可见的一条朋友圈。她向朋友告知了她不发朋友圈不是因为厌恶与朋友的线上社交和互动,也不是拉黑了朋友。这一受访者的朋友圈非使用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线上社交脱离,而是基于控制和维持社交卷入的部分“参与式”非联接,并且这种部分“参与式”非联接是技术操作密集型的(包括更改可见天数、对朋友一一打标签等)。访谈中大部分受访者属于这种非联接状态,即实际上他们并未完全离开朋友圈,他们的非使用状态是在

微信朋友圈可得和可选的功能中达成的。去联接则代表了另一种平台和用户之间的技术博弈。通过较为彻底的方式断开社交联接的可能性,用户的去联接行为反映的是在受限的技术条件中践行完全脱离网络社交的非使用行为。

所谓的逃离朋友圈这个现象,更多是年青一代对信息产品重度使用的情况,我觉得不会成为潮流。一方面你无法战胜自己的心理,现在你知道吗?做APP都要招好几个搞心理的做产品,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你停不下来的,它本身没想让你停。(受访者41101)

届时正在攻读计算机和心理学双学位的受访者41101在访谈中表达了对微信朋友圈产品设计的深刻怀疑,认为朋友圈的人机交互和用户心理学设计隐藏着不健康的社交导向,使用户陷入过度社交的状态并迷失在质量低下的社交中。无论是朋友圈的信息流设计还是部分可见的功能,对于受访者41101来说,都是平台通过精心的黏性设计使用户无法停止使用和断开联接。对线上社交,尤其是朋友圈社交网络的质疑反映在其较为彻底的断联实践中:截止受访日期已完全关闭朋友圈一年以上,期间从未开启或者查看朋友圈功能。相比非联接,去联接在具体操作中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如受访者41101所说,平台通过“停不下来”的黏性设计使完全的“逃离”难以实现。在访谈时,受访者41102表示至今不知如何关闭朋友圈:“我都不知道怎么关闭朋友圈。但我卸载过(微信),我一般不会关闭朋友圈的,我就直接卸载了”。与非联接相比,去联接的技术壁垒更高,也需要更加极端的技术操作。

从早期关闭朋友圈功能的简单操作,到如今多样的“部分可见”选择,非联接的选择越来越多、操作越来越便利、形式越来越客制化。但当前“部分可见”功能里没有关闭朋友圈功能选项,真正意义上实现关闭朋友圈则需要从“设置—通用—发现页管理—朋友圈”里点选或者直接卸载微信,因此去联接在技术上变得越来越不可得。平台试图通过增加非联接功能减少去联接功能,使用户仍然以某种“非联接”的方式参与。去联和非联技术操作复杂性的不

同反映了社交软件服务商的非使用设计和使用者能动性之间的博弈,以控制可见的范畴与彻底关闭朋友圈功能为代表的去联和非联在技术可供性也同样具有较大的差异。用户通过创造性地使用可得联接控制技术获得非联接的媒介非使用体验,而去联接的用户则是通过完全关闭技术功能在有限制的技术可供性中进行媒介抵抗。

(二)去联接与非联接的差异化意义建构

有学者指出,媒体非使用是显在的不消费,用户通过这种方式表演性地建构政治性的自我认同。^②媒体非使用在这个意义上被认为是个人层面上的生活方式实践,并在新自由主义话语中为自我品牌化服务。^③在中国的语境里,媒体抵抗和媒体行动主义是一个较为陌生的议程,在公共领域中很少得到讨论。媒介非使用的话语和实践与其说是一种媒介政治理念,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表现。

上文提到,媒介非使用可以视为媒介技术可供的另类使用,并且这种使用背后有商业技术逻辑和互联网公司的产品化思维所支撑。那么媒介非使用在用户的日常生活和交流中成为社会资本和身份建构的重要语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访谈中,一些受访者将离开或屏蔽朋友圈仪式化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因而在日常线上线下交流中着重向他人叙述其对社交的反思性,成为媒介非使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应当去问询传播仪式背后的人类传播活动的隐喻。^④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个体通过媒介非使用行为所表达的隐喻与其所理解的符号资本勾连起来,进一步讨论去联接和非联接的社会意义建构差异。

在一些受访者的话语里,朋友圈非使用是通过包括印象管理、媒介环境控制在内的一种“不在场”的自我呈现方式。对一些正在经历重大社会角色转变的用户,例如步入职场的受访者41401,过去的朋友圈没有办法再反映当前的自己,记录了不成熟、不完美的“黑历史”。通过“三天可见”等非联接操作,个体完成了迅速的社交网络新陈代谢,汰换不理想的媒介痕迹。非使用行为同时也被用于进行形象管理。

总的来说,关闭朋友圈的人给人一种生活目标、总的生活状态比较稳定,目标比较明确,这两个共性吧。(受访者42501)

受访者42501认为在朋友圈中过于活跃被认为是一种“无聊”和“空虚”生活的标志,而关闭朋友圈则可以塑造“自控、目标明确、生活有条理、精力集中”的形象。因而此类关闭朋友圈的行为可以从非联接的角度理解,即通过非使用在社交网络中塑造充实、积极向上的个人形象,这种形象管理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另类的社交卷入行为。除了把不在场当作自我呈现的另一种方式外,朋友圈的社交环境特点成为非使用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大多数受访者都是20-30岁,在朋友圈里与长辈和领导共处变得越来越复杂。受访者41402是微信朋友圈的早期采纳者,她见证了作为后采纳者的父母和祖父母辈涌入并用中老年人的议程和内容“占领”朋友圈的浪潮。曾经“中二”而热爱在朋友圈发布二次元ACG文化相关内容的她无法在变化中的朋友圈媒介环境里表达趣味和寻求共鸣,因此转向Bilibili和微博社交成为替代性的社交方案。在上述的讨论中,非联接的意义通过不在场的自我呈现、隐匿过去的数字印记和积极主动的社交环境选择得以表达和建构。

就是欲擒故纵,你想想看平时一个经常发朋友圈、经常逛朋友圈的人,突然关闭朋友圈,别人会去问你、会关注你,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关注可能只会持续那么一段时间,可能会一周,一个月,会持续关注,那个时候再去看,如果还持续关闭,可能他的确是对这个不感兴趣了,我觉得是真的断绝朋友圈了,可能是真的不在乎了。如果到时候又重开的话,我觉得他关闭就是一个变相的去吸引人的方式,去吸引关注的方式。(受访者41102)

正如以上受访者对于两种不同非使用状态的体会所揭示的,去联接因彻底的“断绝”朋友圈而被视为某种更为本真的非使用行为,其意义建立在与非联接的差异性之上,体现在对通过非使用进行自我呈现和对网络社交参与的“不在乎”。二者的意义建构还体现在对媒介非使用的社交参与的情绪表达中。过去的研究将媒介非使用的实践视为是对社交

网络日益侵入日常生活的一种情绪性反应,通过停止持续性使用媒介来缓解对保持专注、社交过度 and 隐私暴露的社交倦怠。^⑧本文认为,社交倦怠和社交忧虑在内的媒介使用情绪中介性地构成了非联接性媒介非使用与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关联,但这种情绪结构性地与去联接所带来的体验有所差异。实践非联接的受访者普遍提及离开朋友圈后对失去社会关系和潜在的机会有所担忧。而受访者41403这样为自己的朋友圈去联接作注脚:“享受孤独、自愿缺席”。

之前还是会怕错过什么,可能稍微远一点的朋友圈,如果你消失不见很久,大家想了解你的近况却了解不到,或者说,大家都在拿这个事情去做文章,去开玩笑的时候,你也不在。就是会有缺失、缺席的感觉。但是现在是自愿的缺席……关闭朋友圈是一种享受孤独的方式。(受访者41403)

曾经遭遇过线下朋友圈社交孤立的她在朋友圈非使用的实践里“享受”去联接的社交状态,对孤独和缺席的情绪性感受构成了其反思性社交的内核,也成为自我实现的价值来源。非联接对于“错过”的焦虑与去联接对社交脱离的“享受”的情绪差异反映的是意义建构来源的不同,去联接通过对社交和朋友圈形象管理的整体扬弃来为非使用行为赋予意义。去联接的仪式性断绝实践中,媒介非使用的意义建构不同于非联接中面向他人进行印象管理以及在新的社交联接中获得社会资本,而是转向从自我的情绪感知和社交断绝中完成意义建构,即将社交缺席转化为一种获得感和享受。

(三)去联接与非联接使用行为中的媒介反思性

在前人的类型学研究中,媒体技术的非使用被认为是非常复杂和模糊的决策过程,是一个临时和过渡的决定性时刻。^⑨有研究者富有见地地引入了“情境性非使用”(situational non-use)的概念框架,通过考察内生和外生因素来理解非使用。^⑩朋友圈的超级粘性设计带来了一种使用惯习,因此抵制这种惯性需要一种内生或外生的刺激。这种刺激可以是促使用户改变日常习惯的事件和突发事件,或者是他们对社交媒体参与式文化仪式的反思和态度转

变。当用户决定离开特定的数字应用时,其所处的涌现性情境扮演重要角色。非使用可以是理性思考和计算的结果,也可能是情绪性反应,但都伴随着重要的媒介反思过程。

许多受访者都提及了使用朋友圈造成的时间浪费。一旦个体在生活中遇到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件,朋友圈就会成为第一个被“牺牲”的反思对象。例如受访者41501访谈中提及的离开校园进入职场和新生儿出世。因为考研或者工作忙碌等情况而暂时性地或者情境性地与朋友圈非联接的受访者,大多对自己可能重返朋友圈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大多数也报告了多样的中辍行为例如间歇性关闭、临时开启和重返朋友圈等。鉴于朋友圈的粘性设计和其间培养的使用惯习,许多受访者表示离开朋友圈时有一种失去话题和社交纽带的失落感。离开朋友圈可能不会影响受访者与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他人的联接,但对于维持弱关系,比如以前的同事或朋友的朋友,影响较大。因此尽管受访者41402在几个月前就关闭了微信中的朋友圈功能,但她还是通过查看同事的朋友圈相册来维持“存在感”。在这一意义上,非联接的媒介反思主要以稀缺的时间资源分配为对象。网络社交仍然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话语和社会资源,但在某些时刻可能成为耗费时间资源的阻碍,因而非联接的媒介反思对象主要是基于媒介卷入带来的时间消耗。非联接在反思性的意义上成为了用户能动性平衡网络社交时间消耗的一种社交权宜。

家人离世、被排挤等重大生命事件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突变则是去联接实践的媒介反思触发点,技术脱嵌和媒介非使用的可能性成为这种反思性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当媒介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持久可用性的认知和实践惯习被中断或打破时,媒介所连接和承载的社会关系以及媒介技术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角色成为反思的重要对象,这与非联接行为具有极大差异。

一个下了决心就再也不开启朋友圈的人,可能是看破了红尘、觉得与世界没什么关联,要么便是打算干一番大事业了。(受访者41602)

受访者41602对于下了决心的朋友圈去联接实践的理解,很好地反映了非联接和去联接行为中用户媒介反思的根本差异。前者仍然在维持着已有的社交关系和社交情境,并没有对当下所处的生命历程中媒介的定位进行关键性的重置;而后者在经历重大生命事件后的反思具象为对网络社交的彻底怀疑与断绝,对与“世界”的关联不再感兴趣。遭遇室友和同学排挤的受访者41403在经历抑郁情绪和阅读心理学书籍后决定不再关心周遭的生活世界,构成了去联接媒介反思的良好注脚。

这(离开朋友圈)只是一种做自己的方式。我并不是说我可以自私地做自己;它只是标志着我对社交网络的想法的改变。(41403)

部分受访者所提及的亲人的离世和诞生同样引发了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社交的根本性反思,通过去联接实践对网络社交整体性拒绝。这与非联接的反思作为一种社交权宜和以时间卷入为反思对象形成较大差异。这呼应了上文提及媒介非使用是解决生命历程中的遭遇和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经典叙事,去联接实践中对社交关系的自反和重新安排成为了个人生活政治的重要行为表征。总体而言,非联接和去联接的媒介反思性差异主要体现在反思对象的不同,非联接行为将时间卷入作为对象间接地反思媒介使用,并将媒介非使用视为一种反思的权宜,而去联接行为直接诉诸对社交行为的反思。

五、结论与反思

当人们不再因为缺乏可得性而不得使用技术或者无法利用技术从而被迫处于技术鸿沟的落后一侧时,那么重新理解人与技术的联接性便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媒介非使用现象产生了经典的数字鸿沟和创新扩散等理论无法简单回应的新课题,激

励传播学研究者从复杂的媒介使用行为中提炼媒介技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的路径。媒介非使用可能是不自愿的或者不成功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动机和意愿来理解。^⑧应当回到个体媒介非使用实践的具体语境中,辨析行为背后行动者的能动和反思,理解技术如何结构化和规范化能动和反思的可能性。本文提出“非联接—去联接”的概念,将复杂的主动媒介非使用行为置于可辨析和比较的框架中。

如表1所示,本文指出非联接的媒介非使用指向的是另类的参与和使用,通过积极而复杂的技术操作主动地塑造和选择理想的社交联接方式与社交环境。非联接的非使用行为并非指向彻底社交断绝状态,而是用户通过积极主动地利用平台功能,以替代性的或者有限性的社交媒介非使用形式,能动性地对自我社交环境进行再塑造,从而形成满足自我效能的社交空间。非联接实践的意义建构和媒介反思仍是基于可控的社交参与,通过不在场自我呈现和对社交环境与时间权宜的能动性调节,实现最优的社交连接状态与效能。

相较而言,去联接的实践则指向了对多样化的媒介选择的整体性怀疑与媒介中断。不同于非联接状态下用户利用平台可供的非使用功能进行可控的社交参与和印象管控,去联接指向了更具反思性的媒介抵抗行为。同时,由于平台对彻底断联设置的技术壁垒使去联接更受限制,用户发挥了更强的能动性以拒绝网络社交参与和通过反社交进行意义建构。如果说非联接是在不同的媒介平台里游移和寻找代偿,那么去联接则是弥散性的对网络社交参与的整体性拒绝。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去联接不仅发生在某个社交平台,而是对众多社交媒体的

表1 非联接与去联接的概念辨析

主动的媒介非使用行为	用户能动性		媒介反思性
	技术可供性	意义建构	
非联接 disconnectivity	创造性利用媒介非使用功能;有限、另类的社交方式;	媒介使用自主;不在场的自我呈现;印象管理与社交环境选择	媒介使用的时间卷入作为反思对象;权宜之计;可控的社交环境
去联接 deconnectivity	受限的技术条件下断绝使用;对平台与联接文化的媒介抵抗;	反社交的政治性满足;将社交缺席和孤独视为一种获得性的体验	社交行为作为反思对象;对网络社交的整体性拒绝

断绝使用。在有限的技术可供条件下能动性地对媒介抵抗,反映了去联接实践不再依赖于网络社交参与获取话语和社会资源,而是通过反社交参与建构意义和进行媒介反思。

对比二者的技术条件,笔者认为对媒介非使用的讨论不能脱离对平台的技术可供性的批判性考察。当过度社交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以微信朋友圈为例,社交网络平台服务提供方主动提供多种非使用的选择,通过允许用户有限度的对“可见”范围的控制来避免大量用户根本性的去联接。非联接成为平台粘性设计和用户的能动性之间产生的微妙平衡与共谋协商:一方面用户通过精妙的媒介非使用设置得以控制自我社交卷入,以能动的方式可控进行非使用并从中获取媒介非使用带来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平台也在提供媒介非使用的技术可供性里获得用户驻足产生的经济效益,即以非使用的方式使用。在这个意义上,媒介非使用具有其技术可供性基础和技术边界,而越来越难以实现的去联接则与更具批判反思性的媒介抵抗实践息息相关。去联接的非使用行为断绝了与社交平台的技术共谋,从社交平台所设计的层层媒介非使用的技术阻断中抽离,相较而言是一种更具反技术能动性的媒介非使用,在技术基础和意义来源等方面与平台技术支持下的非联接媒介非使用有着重大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贡献不在于提供一个新的类型学来概括所有的媒介非使用的状况,而是旨在通过“非联接—去联接”的概念框架辨析,呼吁未来的媒介非使用研究中应重视对媒介非使用的技术可供性和用户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微观的分析。技术可供性与能动性在去联接和非联接的媒介非使用中具有不同的关系表现形式:用户在非联接的实践里主要通过平台可供的技术操作行使媒介使用自主的能动性,而去联接则是在受到技术可供限制的状态下通过不使用技术践行媒介抵抗的能动性。在万物互联、永远在线的联接文化里,媒介非使用成为令人瞩目的非常规文化现象,也是个体在当前社交参与文化中的重要个人政治表达。因此本文

还提出应当考察用户如何对非使用行为建构合理化论述,考察其社会意义建构和媒介反思,从而对媒介非使用现象的社会结构与技术语境进行整体把握。因此本文主要从探究媒介非使用中技术可供—用户能动的张力以及考察媒介非使用行为合理化两个角度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本研究的实证研究局限性在于,由于主要的受访者都来自一二线城市和青年群体,对其他的空间和年龄层人群经验的解释较为缺乏。因而希望借本研究分析框架和问题视角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学者基于更多的定量和定性的实证材料关注媒介非使用在多语境实践中的技术——能动关系变迁和意义建构。

注释:

①腾讯研究院 S-Tech 工作室:《社交的尺度:一份社交网络斋戒报告&八个深度斋戒故事》,2017年7月,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752847>。

②Chen, Y., Man, Z., & Qiu, J. L., *Super-Sticky Design and Everyday Cultures*, *Super-Sticky Wechat and Chinese Society*, Emerald, 2018, p.47.

③Pew Research Center, "Teens, Social Media and Technology 2018",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18/05/31/teens-social-media-technology-2018/>.

④Van Dijck, J.,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7.

⑤Selwyn, N., "Digital division or digital decision? A study of non-users and low-users of computers", *Poetics*, vol.34, no.4-5, 2006, pp.273-292.

⑥Alam, M., and Wagner, C., "Facebook distress: A model to investigate discontinuation of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PACIS 2013 Proceedings*, 2013, p.179.

⑦代宝、邓雯雯:《社交媒体用户不持续使用和转移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情报科学》,2018年第5期,第64-70页。

⑧卢珈璟、唐可月、闵庆飞:《社会化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情报科学》,2018年第8期,第94-100页。

⑨郭佳、曹芬芳:《倦怠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不持续使用意愿研究》,《情报科学》,2018年第9期,第77-81页。

⑩黄莹:《语境消解、隐私边界与“不联网的权利”:对朋友圈“流失的使用者”的质性研究》,《新闻界》,2018年第4期,第72-79页。

⑪ Selwyn, N., "Apart from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people's non-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everyday life", *Technology in society*, vol.25, no.1, 2003, pp.99-116.

⑫ Dremljuga, R. R., "The process and affordances of platform-specific social media disconnection", *Studies of Transition States and Societies*, vol.10, no.2, 2008, pp.82-96.

⑬祝建华、何舟:《互联网在中国的扩散现状与前景:2000年京、穗、港比较研究》,《新闻大学》,2002年第2期,第25-34页。

⑭张明新、叶银娇:《传播新技术采纳的“间歇性中辍”现象研究:来自东西方社会的经验证据》,《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6期,第78-98页。

⑮熊慧、郭倩:《朋友圈中辍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新闻界》,2019年第10期,第36-45页。

⑯刘鲁川、李旭、张冰倩:《基于扎根理论的社交媒体用户倦怠与消极使用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2期,第100-106+51页。

⑰ Ribak, R., & Rosenthal, M., "Smartphone resistance as media ambivalence", *First Monday*, vol.25,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download/6307/5136>.

⑱ Bucher T., "Nothing to disconnect from?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an age of machine learning",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42, no.4, 2020, pp.610-617.

⑲ Portwood-Stacer, L., *Lifestyle politics and radical activism*.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2013, p.34.

⑳ Hesselberth, P., "Discourses on disconnectivity and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New Media & Society*, vol.20, no.5, 2018, pp.1994-2010.

㉑ Natale S and Treré E., "Vinyl won't save us: Reframing disconnection as engagement",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42, no.4, 2020, pp.626-633.

㉒ Baumer, E. P., Adams, P., Khovanskaya, V. D., Liao, T.

C., Smith, M. E., Schwanda Sosik, V., & Williams, K., "Limiting, leaving, and(re) lapsing: an exploration of facebook non-use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13, pp.3257-3266.

㉓ Hesselberth, P., "Discourses on disconnectivity and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New Media & Society*, vol.20, no.5, 2018, pp.1994-2010.

㉔腾讯研究院S-Tech工作室:《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看朋友圈?》,2017年5月, <https://www.tisi.org/16016>.

㉕ Karppi, T. (2018).? *Disconnect: Facebook's affective bonds*. U of Minnesota Press.

㉖刘江、赵宇翔、朱庆华:《互联网环境下潜水者及其潜水动机研究综述》,《图书情报工作》,2012年第18期,第65-72页。

㉗ Portwood-Stacer, L., *Lifestyle politics and radical activism*.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2013, p.34.

㉘ Kaun, A., and Treré, E., "Repression, resistance and lifestyle: charting(dis) connection and activism in times of accelerated capitalis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vol.19, no.5-6, 2018, pp.697-715.

㉙郭建斌:《如何理解“媒介事件”和“传播的仪式观”——兼评〈媒介事件〉和〈作为文化的传播〉》,《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第6-19页。

㉚刘国亮、张汇川、刘子嘉:《移动社交媒体用户不持续使用意愿研究——整合错失焦虑与社交媒体倦怠双重视角》,《情报科学》,2020年第12期,第128-133页。

㉛ Hesselberth, P., "Discourses on disconnectivity and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New Media & Society*, vol.20, no.5, 2018, pp.1994-2010.

㉜ Leavitt, A., "When the user disappears: Situational non-use of social technologies", *Proceedings of CHI*, 2014. Retrieved from http://nonuse.jedbrubaker.com/wp-content/uploads/2014/03/NonUse_CHI_Alex-Leavitt_final.pdf.

㉝ Baumer, E. P., Adams, P., Khovanskaya, V. D., Liao, T. C., Smith, M. E., Schwanda Sosik, V., & Williams, K., "Limiting, leaving, and(re) lapsing: An exploration of facebook non-use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13, pp.3257-3266.